

中国古代生活丛书

中国古代的隐士

· 韩 兆 琦 ·



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

03
9

《中国古代生活丛书》

主 编 李学勤 冯尔康
副主编 李思敬
编 委 王齐* 冯尔康 李学勤
李思敬 李 乔 任雪芳*
任寅虎* 常建华 彭 卫
(※为常务编委)

ZHONGGUO GUDAI DE YINSHI

中国古代的隐士

作 者 韩兆琦
责任编辑 林 雷
封面设计 于名川
封面绘画 楼家本
出 版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
(北京东四南大街85号 邮政编码100703)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发 行 新华书店
字 数 100千
开 本 850×1092mm 1/32
版 次 1996年7月北京第1版
199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03-032-X /K·15
定 价 1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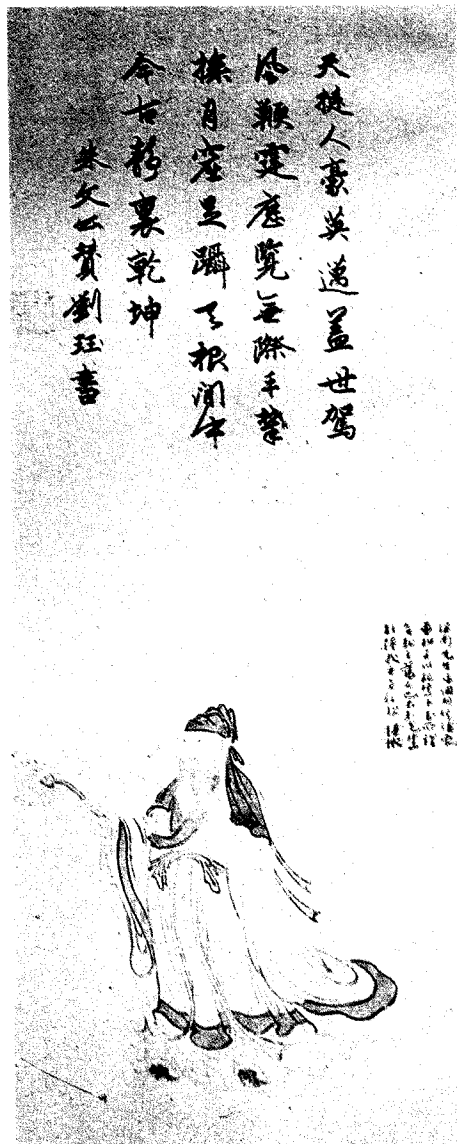
煮茗图



渊明醉归图



孟浩然像



邵雍像轴



根上唐... 古流於山... 一... 一... 一...

升庵簪花图



香山九老图轴

序

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这套“中国古代生活”大型丛书，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，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。

让我们从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“史学危机”谈起。

历史学本来是人类最早建立的学科之一，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视历史，从远古的时候便设有史职，编写历史。在传统的书籍分类中，史书占了一大门类，历代官私所编史书真是汗牛充栋。正因为这样，有的外国学者把中国人称做历史的民族。可是就是这么一门渊源悠久、根柢深厚的学问，在近若干年竟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和曲折，“史学危机”之说在高校里和社会上却很流行。历史学怎样适应社会的要求，怎样摆脱困境而重新振兴，成了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。

当然，历史学的命运不是没有转机，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，这一古老学科已经逐渐转向于一些新兴的分支。其中很值得注意的，有文化史和社会史。文化史、社会史并非新的创意，但过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，走向发达乃是近些年的事。文化史的起步要略早几年，大家记得，由于关心中国

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，社会上曾出现所谓“文化热”，这影响到历史学界，文化史的讨论也热起来了，有关论作一时风起云涌。最近这种热虽然凉了一点，可是专论中国文化的期刊越来越多，内容也更趋扎实。看来文化史的研究是在深入发展，而且走上了正确的轨道。

社会史的开始盛行，可能与历史学的视野渐次拓宽有关。过去比较长的时期，对古代社会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形态，现在则加强了社会结构的分析与社会现象的探讨。这样，有着新的面貌的社会史令人刮目相看。全国性的社会史的研讨会连续举行几届，盛况空前，是这方面进展的明显标志。社会史的研究，现在正是方兴未艾。

社会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拓展，很自然地引导大家注视历代社会的生活状况，试图重现当时生活的图景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社会生活研究应该是社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能忽略社会生活研究与文化史的联系。文化史深入发展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趋势，一个是追索更核心的文化，从而走向学术史、思想史。一个是探讨更广泛的文化，于是走向社会生活的研究。通过古代社会生活的研究，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广泛表现。

社会生活的研究，一个特点是多角度、多层面，因而是非常富有趣味而引人入胜的。应该指出，中国传统的史书，尽管数量浩繁，世间罕有其比，然而内容最缺乏的，就是涉及社会生活的部分。以二十四史（或二十五史、二十六史）为

例，从本纪到列传，不是太偏于国家政治的活动，便是局限于具体人物的事迹，惟独对社会的生活这一方面，所用笔墨甚少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今天着眼于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是多么必要。

生活的研究过去一直被漠视，是有着文化和思想的原因的。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时也说人伦日用无非是道，但这不过是强调道的普遍性，不是重视社会生活的意义。史书应当论述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不同寻常的事迹，而日常生活平淡琐细，不足为训，怎么能载入青史？因此我们在高文典册中看到的，并不是当时社会真实、整体的面貌。

不能反映社会全貌的历史，是没有深刻性的。社会上对历史学作品的不满意，常常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够深刻，而且不是有血有肉。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为曲折多变，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最为丰富多采，并且独具特色，历代的社会生活自然很需要探索研究。

古代社会生活，包括各个时代、民族、地区、阶层和群体的生活，这是历史学一大块几乎空白的领域，其中蕴含着许许多多广大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。开展古代生活的研究，历史就变“活”了，变得更有血有肉，更完整全面。

生活的状态，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而不断变迁。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，差异之悬殊会引起大家的惊诧；同时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绵延不绝，历代社会生活中又有共通的东西，共通之普遍也会引起人们的惊异。

中国疆域辽阔，自古以来是多民族、多地区的国度。这种多样性，既贯穿于文化中，又体现在生活上。阐明各民族、各地区生活的异同，是极饶兴味的。这里说的地区，不只是地理上的，也兼指文化上的，即文化的区系。

不同阶层、不同群体的生活，自然要有明显的差别，分别详加探讨，更有各自的难处。例如宫廷的生活，历来为民众所关注，近几年出版了不少论著，实则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容易。唐代白居易作《长恨歌》，还有人说他是外朝小臣，不能深知宫闱生活的真相。与此相对，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，特别那些被摈于“良人”以外的人们的生活，研究起来就更为困难，需要学者投入更大的力量。

社会生活的研究又需要与一些现代的人文学科相结合，如文化人类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……等等。还有考古学，所接触的也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遗迹。研究古代生活确实是一种新的学科分支，会给大家带来重要的新知识，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。

考虑到古代社会生活范围宽广，内容丰富，我们组织了这套《中国古代生活丛书》，约50种。将在一年内出齐。所列各种专题，是经过反复斟酌的，希望能比较普遍地揭示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诚恳欢迎读者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和组织的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编辑委员会

一九九四年八月

目录

一、隐士的由来	1
二、隐士为何而隐	13
三、隐士面貌的形形色色	25
四、隐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	35
五、隐士的衣食情景	46
六、隐士的居处环境	57
七、隐士的家室亲情	66
八、隐士的社会交往	74
九、隐士与山水旅游	86
十、隐士与诗	98
十一、隐士与学术及艺术	109
十二、隐士与茶	119
十三、隐士与酒	127
十四、隐士与养生	138
主要参考书目	148

一、隐士的由来

隐士也叫“幽人”、“逸士”、“逸民”、“高士”等等，《后汉书》有《逸民传》，《晋书》、《唐书》、《宋史》、《明史》等都有《隐逸传》，《南齐书》有《高逸传》，《清史稿》有《遗逸传》，嵇康、皇甫谧有《高士传》，袁淑有《真隐传》，称呼不一，写的都是同一类人。

隐士是与“官僚”相对而言的，它的含义是说，这个人本来有道德、有才干，原是个做官的材料，但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，他没有进入官场；或者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，后来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而离开官场，找个什么地方“隐”起来了，这就叫“隐士”。当隐士的如果改变行迹，进入官场，这叫“入世”；当官僚的如果改变行迹，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，这叫“出世”。我们就从这一“出”一“入”上，也就可以看出“隐士”与“官僚”的对应关系了。一般的农夫樵子是绝对不能称为“隐士”的，试想，如果一亿人里头有 9800 万“隐士”，那“隐士”还能值钱么！

“隐士”和“官僚”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是一对面貌不同、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。它们彼此依存，有矛盾，也有联系，它们是被历代统治者用来统治国家、统治黎民百姓的两

种政治势力。这对于某些愤恨官场、誓死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人来说,似乎是有点委屈,但少不能胜多,点不能概全,就几千年来滔滔汨汨的所谓“隐士”这种文化现象的总体而言,对其基本性质我们不能不下这样一种严峻的结论。

隐士的历史,应该和“官僚”的历史一样久远,应该是自从有了官僚,同时也就有了“隐士”。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的“官僚”与“隐士”究竟是什么样子,我们今天说不大清楚,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,绝大多数都是封建时代的人写的。这里面尽管也写了某些奴隶社会,甚至原始社会的人物、故事,但这些有的只是一种传说,更有些完全是出于带有个人目的、个人色彩的编造,所以可信程度很差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既然我们今天没有那时的材料,而只有现存的这些故事和传说,因此我们在这本书里也不妨连带着说说,只不过我们对这一部分材料不必太认真就是了。

中国最早的隐士,看来要算巢父、许由、王倪、善卷等人了,据皇甫谧《高士传》说:许由是唐尧时代的人,唐尧想把天下传给他,许由不仅不接受,而且还认为是唐尧这话弄脏了他的耳朵,于是赶紧跑到颍水边上去洗。正当许由在颍水里洗耳朵的时候,有一个人牵着牛到水边来饮,这个人就是巢父。他问许由在干什么,许由把事情向他说了一遍。巢父听了很生气,说:“你在河里这么一洗,不是把整个河水都给弄脏了吗?那让我的牛还怎么喝!”于是便只好牵着牛绕到上游去饮了。这种故事大体都来源于《庄子》,是庄周学派为表达自己

的政治观点而编造出来的情节。司马迁对此是不相信的，他在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曾特意地加以辨明，剔出不要。

到了商朝末期，出过三个大隐士，即姜太公和伯夷、叔齐。据《史记·齐世家》说：姜太公一辈子怀才不遇，到处碰壁，直到70多岁了还在渭水河边上当隐士。有一天，西伯姬昌（即日后的周文王）要出门打猎，临行前占卜，得到的解释说这回获得的将不是龙、不是虎，而是一位王者之师。结果周文王在渭水边上遇到了姜太公，后来姜太公遂辅佐周武王灭掉了商朝，建立了西周王朝。关于伯夷、叔齐，据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说：伯夷、叔齐是孤竹国君的长子与三子。老国君死后，遗命传位于三子叔齐。叔齐不受，让位与大哥伯夷。伯夷也不受，兄弟二人遂一齐离开孤竹，前往投奔西伯姬昌。当时姬昌已死，周武王正载着其父西伯的灵位，出兵东下讨伐殷纣。伯夷认为这是不仁不义的，于是前去扣马拦阻。周武王不听，终于灭掉了殷纣。伯夷、叔齐赌气地隐于首阳山，发誓“不食周粟”，最后竟自饿死了。伯夷、叔齐曾受过孔子的表扬，司马迁认为可信，于是把他们写在了《史记》“列传”的第一篇。

春秋时代的隐士，据《左传》记载有介之推。介之推与赵衰狐偃等都是晋文公的佐命大臣，他们一同跟着晋文公在国外奔走了十几年，最后辅佐晋文公打回了晋国。晋文公取得政权后，介之推看不惯群臣们那种争权夺利，那种“贪天之功，以为己有”，于是不告而别，躲到深山里去当隐士了。晋文公无法寻找，心想如果放火烧山，肯定可以让介之推自己走出

来。没想到介之推抱木焚死,竟是宁死也没有出山。当地的老百姓同情介之推的遭遇,遂把每年阴历清明的前一天定为“寒食节”,每到这一天大家都不生火,以此来表示对介之推的悼念。春秋末期的隐士,据《论语》记载有长沮、桀溺、楚狂接舆、荷蓑丈人等。据说有一天孔子在蔡国的田野上迷了路,刚好这时路边的田里有两个高大粗壮的汉子(长沮、桀溺)在那里耕作,孔子便打发子路前去询问。两个汉子说:“那边车上坐的是谁?”子路说:“是我们老师孔丘。”汉子说:“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吗?”子路说:“是的。”两个汉子连头也不抬地说:“他那么聪明的脑瓜还用得着向我们问路!”接着又问:“你是谁?”子路说:“我叫子路。”两个汉子说:“如今天下黑暗动乱,就如同那滔滔的洪水,到处都一样,谁整治得了?你与其跟着你们先生东奔西跑地躲这个,投那个,什么时候是个完?你还不如来跟着我们干脆同这个倒霉的世道彻底决裂!”后来孔子在楚国首都的街上路过,忽然一个“疯子”(楚狂接舆)赶到了孔子的车旁唱道:“凤啊,凤啊!你的人头儿怎么变得这么次啦?过去的‘圣世’已经一去不再复返,还是多想想今后的日子吧!完啦,完啦,如今的官场上可尽是些危险人物啦!”孔子听了很有感触,刚要下车找他谈谈,可是一转眼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战国前期的著名隐士有段干木,魏文侯时人,据说魏文侯请他做官,他不做;魏文侯去拜访他,已到达门前,他避而不见竟翻墙而走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里写过一个隐士颜闾(chù 处)。据说有一次颜闾遇到了齐王,齐王向颜闾招呼说:“颜闾你过

来。”颜觸说：“齐王你过来！”齐王不高兴地说：“究竟是国王尊贵，还是你这个士子尊贵？”颜觸说：“国王不如士子尊贵。当年秦兵攻入齐国，秦将下令说：‘柳下惠当年是这一带的名士，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坟墓。不管是谁敢到他的坟上去割一把草，也将定斩不饶。’接着秦将又说：‘谁要是能够砍来齐王的人头，他将得到千金万户侯的爵赏。’两相比较看来，活齐王的人头似乎还比不上死士子的坟丘哪！”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，值得怀疑，因为《战国策》作者写书的意图就是为了吹捧士人，夸大士人的作用，来为他自己所属的士阶层张目。但是战国时期的士人，不论是策士、文士、侠士、隐士，他们都有一种傲视王侯的习性，这一点倒是的确存在的。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中有老子和庄子，他们都发表过许多非常典型的隐士言论，所以尽管当时没有人称老子、庄子为“隐士”，但后来的人们写《高士传》时却总是把他们写进去的，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把他们归入了“隐士”的范畴。

秦末汉初的隐士著名的有圯上老人与商山四皓。圯上老人就是张良早年避难时在下邳破桥(圯)上遇到并接受了他的赠书的那个颇有神秘色彩的老头儿。商山四皓见于《史记》，他们是秦末的隐士。当刘邦灭秦灭项建立了西汉政权，晚年想要废掉太子刘盈，另立赵王如意的时候，吕后听取张良的主意，派人请来了商山四皓，通过他们的活动，保护了太子刘盈的安全。

从遥远的荒古到西汉时代，在这两千多年中间，有记载的

隐士是不多的。从这些有记载的隐士的政治态度上看,以厌恶官场,不与现实统治者合作的居多。也正由于他们人少,成不了什么大气候,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一贯可循的政策,基本上是任其自生自灭。尽管孔子也曾大声疾呼过什么“兴灭国,继绝世,举逸民”,但当时并没有谁来理睬他。

西汉末年,王莽篡位,这引起了许多官僚与士人的不满,不少人纷纷离开官场去当隐士了,这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,所以汉光武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,很自然地就做起了“举逸民”的工作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说:“光武侧席幽人,求之若弗及,旌帛蒲车之所征贲,相望于岩中矣。”招集前一个王朝的反对派来为自己服务,既得实利,又获好名声,刘秀何乐而不为呢!这大概是封建王朝真正从国家的政策制度上作出的优礼隐士的开端。但东汉王朝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,“自后帝德稍衰,邪孽当朝,处子耿介,羞与卿相等列,至乃抗愤而不顾,多失其中行焉”。也就是说,从东汉后期开始,脱离官场,与现实政治对立的隐士又多起来了。

我们需要分清的是,西汉后期隐士的出现,是针对王莽篡位这一个具体事件而发,而东汉后期隐士的大批出现,则不仅是针对着某一个人、某一件事,乃是与一种时代潮流、一种社会风气紧密相关了。东汉后期由于前后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、禁锢,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,东躲西藏,饱受颠沛流离之苦,这使当时很多人的心灵上都蒙了一层悲哀绝望的阴影。同时随着西汉以来“学而优则仕”这条读书做